

《回顧與反思》新觀察

封從德

28年前有一個8天的會議，兩年後，1993年6月，會議記錄《回顧與反思》在德國出版。出版機構德國萊茵筆會在前言中寫道：

「曾經參加和領導了八九學運、後流亡海外的17位學生領袖于1991年7月17日至24日在法國巴黎舉行了『八九學運歷史回顧與反思研討會』，對這場中國現代史上偉大的民主運動進行了回顧和反思。……研討會對從1988年直到六四大屠殺的幾乎所有學運事件包括許多細節進行了核對、查證，有些問題提出了不同的版本而沒有作出結論。歷史的見證——《回顧與反思》一書根據會上發言錄音整理，不在內容上作更動，只是經過與會人員的校訂，刪去發言人認為可能涉及某些仍在大陸的人士安全的部分。……由於參加此次研討會的人員大多是領導這次學運的核心人員，所以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又由於在此次研討會上談及的第一手資料許多都是第一次向外界透露，所以本書內容對研究這次運動具有極大的意義，是一本研究八九學運不可缺少的史料。」

感謝「六四30周年——中國民主運動的價值更新與路徑探索國際學術研討會」的邀請，讓我有機會向大家匯報。最近，原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學生糾察隊總指揮張健突然去世令我極為悲痛，本文就從討論張健的職務及由此引發的思考，從較大的尺度對八九學運及民運做一整體反思。而原計劃撰寫的細節考訂，請讀者參閱我日後會出版的《「回顧與反思」全文與註釋》（暫定名）。

一、張健的職務

2001年5月我正在忙著新開張的六四檔案網站，有一天，法國國際廣播電台中文部主任吳保障突然給我電話，問我是否認識張健，說他已經到了巴黎。很快我們見了面，張健一拳捶到我胸口，和當年一樣中氣十足。“老封啊，這次我繞道德國來巴黎，就沖你來的！”然後細細說起他「六四」凌晨如何受傷、在同仁醫院的遭遇、如何在國內隱姓埋名，最後借商務考察經德國來到巴黎。張健很快就取得法國的政治庇護，隨後進入海外民運新角色，與法輪功朋友合作辦報、辦語言聊天室、接受採訪、寫詩譜詞編歌，十八年如一日宣揚民主，揭露中共「六四」屠殺、鎮壓法輪功等等維權活動的種種暴行，最後成為堅定的民國派，期望中國儘早能回歸民國四六憲法的民主憲政軌道。

詭異的是，有些原「異議人士」甚至「六四學生」開始連篇累牘地質疑張健在天安門廣場上的職務與槍傷。起初我也不在意，以為只是吵架，而張健脾氣大也容易得罪人。後來愈演愈烈，質疑變否認，宣稱張健根本不是「廣場指揮部學生糾察隊總指揮」，甚至說我的《六四日記》和柴玲回憶為他作偽證，論據是：之前出版的《回顧與反思》中沒有提及張健這一職務。

此論據不成立。巴黎會議上明確提到了張健這一職務，但因安全顧慮刪了。下面就是張倫的回憶：

「那個張健我不知道他最早什麼時候在廣場上，但是戒嚴的那天晚上他肯定是在廣場上的。他說他是糾察總長，我還跟同學們說，“既然他是糾察總長，你們就都聽他的”。」

這句話本應出現在《回顧與反思》第278頁的兩句話之間。萊茵筆會編輯過程中有兩個錄音打字原稿，我尚有保存，這段話分別在第205和125頁，本文附件是其影本。

17同學一道核對八九學運全過程，細節太多，巴黎會議雖有8天，時間依然很緊，只有一小節專門討論「糾察問題」（4.8.4(1)小節），張倫主講。張倫回憶張健是「糾察總長」，與會者沒任何異議。張倫說的情況——當時糾察工作全靠同學們自覺維持——與會者更沒有異議，因為大家都清楚學運的自發性，自然導致多中心，隨即便有「奪權與“政變”」問題（4.8.4(2)小節）。

否認張健職務的人有一誤區，以為廣場糾察總指揮（或糾察總長）只有一個。實情絕非如此，其實有好多，也是由於多中心。譬如張倫並非在校學生，而是社會上的「社經所」團隊組建的「首聯」任命的糾察總長，在職的時間也不長（5月24-29日）。又如趙昕，外高聯任命的糾察隊總指揮，外界近年才知道；還有許多各校自治會任命的糾察隊總指揮，外界根本不知道。「社經所」團隊實力雄厚，上千萬資金（相當於今天十幾億）和數十位帶薪骨幹，已運作好多年，因此印刷了大量的成立宣言和任命名單。而學生團體的糾察負責人如張健、趙昕，根本沒什麼任命名單，一個會甚至一句話就任命了，隨即投入戰鬥。因此，拿印刷名單來「考證」此類職務的真偽，完全是不了解情況。但「考證」得最起勁的人卻又都經歷過廣場歲月，為何也這麼不了解情況，頗令人費解。

更令人費解的是，當我出示大量當時的港台媒體報導時，這些細心「考證」的人卻完全不予採信，說是張健撒謊，自吹自擂。而事實是：1989年6月2日香港《天天日報》22版載張健為「廣場糾察隊總指揮」，《港人日報》頭版記為「糾察總長」，類似報紙還有香港《華僑日報》頭版、香港《信報》第6版、臺灣《中央日報》等等，我並沒全方位搜索，應該還有很多；最近網友又發現當時的英國電視報導，稱張健是The Students' Chief of Security（學生安保負責人）。一個不會英文的張健，怎可能同時對眾多的海外媒體撒謊、而且是在十數萬人聚集的天安門廣場上公開撒謊？採訪時周圍那麼很多人，就沒人當場戳穿嗎？

不僅針對《回顧與反思》，「考證」者還說廣場指揮部四位正副總指揮的回憶都沒有提及張健的職務。這也不成立——至少總指揮柴玲和我的書中明確提到了。《柴玲回憶——一心一意向自由》第187頁寫道：「還有張健，這個天安門學生衛隊的總指揮」（「衛隊」應該是指「糾察隊」，柴玲回憶中文版譯自英文版，翻譯得很彆扭。但英文版第161頁左邊的一張照片顯示1989年5月27日傍晚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的記者招待會上，張健就坐在李祿、劉蘇里身後，旁邊還有我和柴玲、王丹、吾爾開希等人，清楚顯示他是廣場組織者中的重要一員）；而我的《六四日記》則在第406、411、412、464頁等處，都指明張健是指揮部任命的糾察總指揮或糾察總長）。可惜李祿和張伯笠的回憶中沒有提到張健。

為何張健遭到如此密集的攻擊？一因其槍傷：「六四」凌晨在天安門廣場上受傷；二因其身份：廣場指揮部學生糾察隊總指揮；三因其志向：光復民國、回歸憲政。張健的特殊經歷讓中共五毛極為尷尬，讓中共所謂「廣場清場沒開一槍」、「學生領袖無一傷亡、事先全體逃離現場」的謊言不攻自破，必慾除之而後快。因此就有人拼命否定其槍傷的真實性，又有人拼命否定其身份的真實性，網上大量中共五毛跟著大肆渲染。雖然張健個性張揚又嫉惡如仇，容易得罪人，有時也確實馬大哈（子彈駐留部位明明是「股骨」幹上三分之一處，卻說在「肱骨」），但僅此很難解釋長期的攻擊。民運「內鬥」屢見不鮮，大多很快過去，而對張健的人格攻擊卻長達七八年，去世都不放過。

「學生領袖無一傷亡」是中共的典型宣傳，其實是句廢話，也是一個悖論：所謂「學生領袖」，大抵就是媒體知名的學生，而死傷的同學，外界多不知道，就不會是「學生領袖」了。張健如果沒受重傷，而是像一些同學那樣很快到了海外，自然會被媒體稱為「六四英雄」、「學生領袖」。「六四」後不久到海外的好些學生，貢獻與犧牲根本沒張健大，都這樣被稱呼，外界也不會質疑。張健12年後才到海外，這時「六四」光環早已退色，而中共一直宣揚的上述謊言卻開始大行其道。直到張健去世，媒體也很猶豫是否稱他為「學生領

袖」，其實張健曾率領廣場上千上萬的糾察隊員，令行禁止，才是真正的學生領袖，而那些逃避「六四」屠殺現場的所謂「溫和派」，中共五毛和大外宣不僅不責難或質疑，反倒明裡暗裡捧抬他們是什麼「理性」、「溫和」的「學生領袖」。

這裡，我們就遇到另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記憶的戰爭。

二、記憶的戰爭

最近和方政等幾位朋友討論，他們如張健一樣，也是八九學運的自發參與者，曾有重大犧牲奉獻，大家都有共同的感覺：外界談論的八九民運，與我們親身經歷的，相距甚遠；對八九學運和民運的組織過程的描述，幾乎都跟著中共宣傳（尤其反宣傳）的指揮棒旋轉。像《回顧與反思》這樣的基本史料，在三十年後的今天，幾乎不在主流媒體的討論範圍，而嚴重扭曲八九民運的一些資料卻大行其道。這類扭曲資料，除了明確是中共宣傳機構出版的書籍和音像資料外，以1995年問世的影片《天安門》和2001年出版的《天安門文件》（中文版稱《中國「六四」真相》）最為典型。

影片《天安門》重點突出廣場學生指揮部總指揮柴玲在「六四」前一周的錄像講話，將原錄影帶中相隔40分鐘、分別對兩個記者（一是美國留學生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一是香港《天天日報》記者梁淑英）講的兩句語境完全不同的話，剪出拼接在一起，就變成「別人流血、我要求生」這樣妖魔化的言辭，成功地進行了人格謀殺。這種人格謀殺，還得到其它一些手法的加強，譬如柴玲其實根本沒有先逃走（許多中共五毛至今還依據該影片散播這一謊言），影片卻巧妙地隱匿她在「六四」凌晨最後撤出廣場的隊伍中這一基本事實，又掐頭去尾將轉述他人的話變成本人陳述，並利用強烈的不實言辭作對比批判等等，詳見我在1998年出版的《天安門之爭》一書。

這裡再舉一例，說明影片《天安門》如何利用強烈的不實言辭作對比批判，加強妖魔化的效果。影片中先展示被中共抓捕的蕭斌描述戒嚴部隊「用坦克壓學生」及之後電視認「罪」的畫面，然後配一段柴玲「六四」後聲淚俱下控訴坦克碾人的講話，最後便是侯德健冷冷的一句：不能用謊言對付謊言。而影片中卻沒有在六部口坦克追碾撤離廣場的學生的畫面，也沒有被坦克壓斷雙腿的方政。實際上，六部口坦克碾人的鐵證早已廣為報導，方政在影片問世前三年也公開站了出來，但《天安門》就是毫不提及；明明柴玲「六四」後在國內逃亡了十個月，影片剪輯卻讓人以為她很快就在海外，於是給觀眾的印象便是柴玲如何的沖動、誇張和撒謊，以證明「毫無理性的學生」這一結論。

在這一段影片中，柴玲提到死亡人數在兩百多到四千多之間。這本大致不錯（「六四」死亡人數應在三千左右，證據有四：一，「六四」當天早上中國紅十字會就說是二千七；二、北大籌委會和北高聯派出28輛校車數百人去幾十家醫院的調查結果，將近三千（見王有才和常勁的「六四口述實錄」）；三、北美學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書中有六四當天11家醫院的死亡數字共478人，据此他推測整個北京124家醫院應有2800人死亡（T.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p.161-162）；四，解密的蘇聯情報也說是三千。而且，這只是「六四」當天在醫院調查的，應該還有不少醫院外及之後死亡的；另外，丁子霖名單第2號王楠的案例證明還有大量失蹤、屍體被中共秘密處理的情況。其實三千之數已經比較保守，當時的報導引用西方情報機構的數字要高很多，比如北約情報人員估計是七千。）但是，影片《天安門》卻在柴玲這句話後面，馬上就是侯德健的反駁：「很多人說，廣場上曾經有兩千人被打死，或者是幾百人被打死；在廣場上有坦克碾壓學生撤退的人群，等等。我必須強調，這些事情，我沒有看見。」隨後就說不能用謊言對付謊言。這之前，影片《天安門》已經這樣解說廣場清場後的情況：「市民和軍隊的衝突又持續了好幾天。雙方都有傷亡。」這和中共慣用的模糊焦點、

混淆概念的手法一樣，將軍隊屠殺平民，說成是「雙方都有傷亡」。影片這樣含混處理，觀眾的普遍印象便是六四學生在說謊，後來大量的中共五毛也據此否認「六四」屠殺、攻擊民運。

不僅沒採訪方政，影片《天安門》選擇的知識分子也非常離奇——對八九學運和民運有重大影響的知識人基本上都不見身影（嚴家祺、方勵之、包遵信、鄭義、沈澤宜、陳明遠、徐良英……），卻由共軍總參特工戴晴扮演知識分子的代言人。整部影片可說是為戴晴量身定製。該片畫龍點睛的一句話就是戴晴說的「毫無理性的學生和毫無理性的政府」，意思是「六四」悲劇就是這種對抗的結果。「毫無理性的政府」早在89年就暴露無遺，95年《天安門》要揭示的自然是「毫無理性的學生」——影片發佈前，戴晴就已在自己的書中得意地宣佈了這一主題——「陰險的見習政客們正用犧牲別人的生命來為自己鑽謀」！

為何選擇如此偏頗？這就必須了解製片人卡瑪。許多觀眾，尤其是中共五毛，常說影片《天安門》是美國學者製作的，非常「客觀、中立」。就連我在1998年出版的《天安門之爭》中也說不相信卡瑪有「親共背景」。而實際上，卡瑪Carma Hinton出生在紅色中國，文革中是熱衷造反、抄家和告密的紅衛兵頭目，1971年底被周恩來送到美國，與她父親韓丁William Hinton（中共第二號的「老朋友」）一道成立「美中人民友好協會」，推動中美建交。這時卡瑪已22歲，中文比英文好很多（大家可以聽她唸的該片解說詞）。卡瑪曾受到周恩來、張春橋等中共領導人多次接見，《人民日報》至少8次刊登報導與照片。周恩來送她到美國前夜，與這家子通宵達旦談了6個小時，顯得與卡瑪很熱絡，說「卡瑪你比我強，我犯過路線錯誤，你沒犯過路線錯誤」；被問及林彪事件，周竟說「卡瑪你知道的比我知道得多。你知道的守你的紀律，我知道的守我的紀律。」繼《天安門》之後，卡瑪又拍了一部掩蓋文革罪惡的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她在文革中的惡行才被揭露出來（大家可網搜王容芬的文章）。一位美國檢察官哈里斯Benjamin Harris看了卡瑪的影片，奮力追蹤打人殺人的紅衛兵，評論道：「卡瑪繼承了韓丁家族的家風，即拿虛擬作品當紀實作品寫」——《八九點鐘的太陽》如此，《天安門》也是如此。

影片《天安門》引發民運陣營內巨大爭議，但當時的民運刊物《北京之春》、多維新聞網、美國之音、紐約時報、聯合報都為它保駕護航。這也是外界至今以為該片「客觀、中立」的緣由之一。如今，多維新聞網已經賣給中共，編輯部在北京。和戴晴一樣化妝成「異議人士」的後來任美國之音中文部主任的龔小夏，早在1990年6月就在美國國會作證要求無條件給予中共「最惠國待遇」（我則在同一聽證會上要求與人權掛鉤），這時也竭力為影片《天安門》保駕護航，對八九學運和民運大加鞭撻。《北京之春》主筆胡平則藉此進一步大力批判八九學運和民運所謂的「激進」，宣揚其「見好就收」論，卻不刊登我最後的反駁文章，我只好三年後出版了《天安門之爭》。總之，護航的影響極大，批駁的聲音極弱。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關於《天安門文件》真偽的辯論上。編撰者張良是化名，始終沒露面；其二千份中共機密文件原件（起初說是八千份），至今未見公佈哪怕一份文件影本。書中不僅有「機密文件」內容，還大量參雜張良的評論，二者混在一起，譬如多角度對中共國務院發言人袁木的非議（「投機」、「察言觀色而受寵」、「公開撒謊」、「不知羞恥」……見中文版第237-242頁「袁木的對話」一節近三千字，英文版明顯感到不妥，所以大大壓縮至半頁紙，見第95-96頁），看起來「張良」是中共高層的一群秘書合用的化名。他們對中共早期人物並不熟悉，書中誤將拒絕「六四」鎮壓的38軍軍長徐勤先說成是中共已故大將徐海東之子，而且編撰成楊尚昆對鄧小平說的話。另外，有些部分明顯抄自「六四」很久後成文的38軍軍史。而我在2001年就撰文指出該書對5月14日晚十二學者到廣場的描述明顯錯誤，其實是抄了戴晴1992年攻擊學運的文字，連裡面錯誤都照抄，清晰表明絕不可能是學運期間中共特工的報告，卻至今未見張良或三位寫序背書的美國學者的任何回應。最後，全書的偏向也很成問題，似乎楊尚昆不贊成六四鎮壓。又譬如六四死亡人數，書中根據幾家醫院的情況歸納為「二百人左右，傷二千人左右」（第926頁），英文版（第385頁）顯然感到有誤，改成「二百多人死亡」。無論如何，這個數字都低於哪怕是官方公佈的報告。但是，這些明顯的錯誤並不受到外界的關注，依然是護航蓋過證偽。美國著名學者、多維新聞、明鏡出版社、海外各種媒體和機構的保駕護航，使這本書成為「六四」研究廣泛使用的基本資料，大大超過《回顧與反思》這類史料的影响力。

為何出現這樣的離奇現象？這就必須了解中共發動記憶戰爭背後的三層暴力：直接暴力、結構暴力和文化暴力。表層的直接暴力（如「六四」屠城）導致直接謊言（如「未開一槍未死一人」、「學生領袖無一傷亡、事先全體逃離現場」），雖在「牆」迷惑一些人，牆外就較易識別。目前的六四研究，主要集中在這一層揭露中共。

中層的結構性暴力就比較不易察覺，目前的六四研究很少到這一層。結構性暴力又分為壓榨、滲透、分裂和排斥四個方面，這在「六四」前後中共控制民運的手法中廣泛使用。2009年我在《六四日記》後記中推測中共在運動中安插自己人、或瞭解其弱點而能容忍的人、或寧願是這些人而不是別的「死硬份子」的人，讓這些人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有些甚至在運動前就以「民主人士」面貌出現，倍受海外媒體關注（最近給《回顧與反思》加註，深感今日民運與當年的校園內外民間團體很類似，山頭林立，魚龍混雜）；有些則在運動中或另立山頭，或滲入領導核心，卻在四二七突然阻止大遊行、在五四突然運作復課；之後再製造新聞，成為明星「領袖」，但在五四後校園民主蓬勃發展時，突然發起有利於強硬路線的非組織的絕食；在學生占領廣場後進入指揮核心，利用舉世矚目的電視轉播的與李鵬的會談，增強其曝光度，卻在會談前刻意安排幼稚的低年級學生主要發言，以便找到學運的漏洞，為已經定好的鎮壓尋找借口；在廣場後期，讓這些人發揮作用堅持到最後鎮壓，並將試圖運作撤離的人秘密逮捕；在六三夜間，又讓這些人製造燃燒瓶等暴力「武器」，為當晚的鎮壓提供口實，並在廣場清場時，配合當局「沒放一槍、沒死一人」的宣傳，將焦點轉移到「是否有廣場大屠殺」上；然後，在「六四」後的所有官方資訊中，刻意拔高這些人在運動中的作用和地位，將他們沒參與的事情也說成由其主導，使海外媒體和人權機構都跟隨中共的指揮棒旋轉，以奠定這些人日後在海外民運中的「領袖」地位，並在當局早就分布在海外各界的情報網、統戰網和宣傳網中得到幫助，占據資源，繼續在關鍵時刻（如爭取最惠國待遇、WTO和奧運）發揮別人起不到的作用。而像張健、方政這樣的「六四」活見證及大量的堅定而有力的反共人士，則用壓榨、分裂和排斥的手法，刻意抹煞其作用，或使其消音，或遭污名化、妖魔化，以配合文化暴力的運行。

最深層的文化暴力，即強制性洗腦，通過教育、文藝、出版和學術研究等方面的政治控制，為直接暴力或結構性暴力辯護，將其合理化（如「三年自然災害」、「六四平暴」、民運污名化、「中共是抗戰的中流砥柱」、「孫中山的真正繼承人」、「新三民主義」……），讓年青人缺乏紮實的歷史、政治、哲學等人文知識，使認識不清、判斷有誤、決策偏差，八九年如此，今天也如是，成為中共暴政自覺的奴隸而不自知。

三、百年的民運

八九民運為何沒能成功？我認為根本的原因是缺乏三個條件——可靠的史識、正確的政綱和有利的團隊，無法從民變達成兵變、政變。了解暴力的三層，就比較容易理解為何《回顧與反思》中完全沒將1989年的民主運動同1911年的辛亥革命聯繫起來，也沒同百年來的民主革命聯繫起來，卻將中共極左的「五四」反傳統觀念當作正面的價值（「新啟蒙」、「愛國主義」、「文化反思熱」、「河殤」……），我們真以為「舊社會」沒有憲政民主的起步，以為那時國民黨專制、共產黨追求民主；而不清楚從孫中山到張君勱，更不瞭解從三民主義、辛亥革命到〈四六憲法〉、〈新儒家宣言〉的新道統、國統與法統。這種認知缺陷相當普遍，不僅學生，尤其是體制內的知識分子，皆深受文化暴力之害。巴黎會議上，兩位原共產黨員學生的發言清楚顯示這種認知局限。一個說「中國從未出現過真正追求民主的人民運動」（完全不了解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至四六憲法的歷史）；另一位說「暴力奪權必然暴力保衛」（這是中共學者典型的「告別革命」謬論，背離美國大革命、辛亥革命等基本史實）。「六四」學生受此蒙蔽，錯失良機，沒能像辛亥革命那樣，在大規模民變的基礎上，利用專制軍隊的兵變，達成民主革命的成功政變。

其實當時有機會成功，八九學運可說是發揮到極致，甚至在五月下旬已經想到了後來「茉莉花革命」的運作方式（北高聯主席楊濤提議、我補充的「空校方案」，將一個廣場變成全國數百個廣場），正因缺乏可靠的史識、正確的政綱和有利的團隊，該方案很快就被「自己人」阻攔，根本無法實施。也就是說，因為文化暴力，我們根本沒有正確的民主革命目標和方略，只能被困在保共改良的框限中打轉轉，最後遭受屠殺。而辛亥革命前好幾年，同盟會便有清晰的綱領、計劃與方略。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十三文件，擬訂革命過程中一系列宣言、編制、規則、條例、佈告、章程的樣式，不僅闡釋孫中山「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綱領、規定革命成功後中華民國的性質和建立方法，而且還設計了具體的步驟（分軍法、約法、憲法之治三期），逐步實現上述綱領。因此，武昌起義後革命軍政府便很快按部就班地組織起來。台灣的民主化有南京四六憲法為框架，回歸憲政的基礎比較好。而八九民運就差很遠，即便數百城市數千萬人風起雲湧，我們卻未跳出中共偽憲法的框限，只能提出一些改良建議，下跪遞交中共都未接受，甚至遊行時還打著「支持四項基本原則」、「擁護共產黨」之類荒唐的橫幅。而北大、清華等學運組織最初提出的校園民主方案，雖有衝破黨禁、報禁（建立獨立學生會、獨立校園報刊）的目標，卻被一些個人草率的絕食行動衝擊得煙消雲散。

另外，八九民運也缺乏事先的訓練與組織。這是欠缺綱領、計劃與方略之必然結果。那時我們連如何開會也得從頭摸索，更不用說如何建立民主程序與組織、如何靈活運用非暴力抗爭的各種方法、如何談判如何妥協等等。如果我們當中有骨幹早些接受過這些訓練，就會在一刻千金的運動中節省大量寶貴的時間，提高反對派運作的效率，更有力地打擊專制勢力，早日實現民主憲政。

「六四」後，這種割裂歷史、不在百年民運的大歷史中探討八九民運的理念與價值的傾向，在之後的三十年也大致如此。少有的例外是胡平91年秋寫的〈辛亥八十秋：1911-1991〉（《中國民運反思》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年），及陳小雅〈關於辛亥革命「避免論」的幾點思考〉（《求索》1992年第6期）。胡平強調清末和中共改革派的重要性，稱贊辛亥革命的妥協性，說是合理的（民主革命暴力僅限於打垮舊的專政政權）、自願的（減少流血的策略考慮）和不得已的（革命力量有限），並說「今天的民主派應該學習」，這和胡平「六四」後主張的「見好就收」一脈相承。

然而，見好就收的妥協性對漸進改良也許有益也許無益，而對民主革命（尤其是針對極權專制的）則是一劑毒藥，因為過早的妥協不僅達不成目標，還會半途而廢只得從頭再來，白白犧牲更多的生命和寶貴的時機。陳小雅已經敏感到這一關鍵問題，指出「辛亥志士們的一個最大錯誤」，那就是「與北方的袁世凱作明知無望的妥協，把革命成果拱手送人」。她認為應利用共和理念的先進性和南方經濟的資源優勢，先在南方鞏固勝利果實，擇機再與北方決戰。這與我2012年的〈民主如何鞏固？——試析辛亥革命中的「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論〉一文不謀而合（我最近才細讀陳文），其中批駁了取消革命、支持妥協的三種說法：兵力不濟說、避免流血說、民主政黨說，也正好與胡平贊同妥協的三點針鋒相對（我也是最近才細讀胡文）。

四、結束語

如果從孫中山「興中會」發動第一次廣州起義算起，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已經125年了。辛亥革命沒完全成功，革命黨妥協派僅滿足於推翻滿清，而非真共和，結果走了百餘年的彎路；八九民運更沒成功，根本原因在於不知何為成功（落實四六憲法）、如何成功（民變、兵變、政變）。這種無知源於文化暴力，因此越受中共教育，毒害越深。像張健這樣沒受中共高等教育的，反而自由後很快就認准了孫中山、辛亥革命、四六憲法這一民主革命正途。這無需高深的學問，只要常識和真實的歷史。而中共則要千方百計攪亂歷史，利用手中的資源優勢，採取三種暴力手段，掌控記憶的戰爭。這場戰爭遠未結束，這場戰爭正在進行。

民國108年4-5月

那个张建我不知道他最早什么时候在广场上，但是戒严的那天晚上他肯定是在广场上的。他说他是纠察总长，我还跟同学们说，“既然他是纠察总长，你们就都听他的”。

我觉得实际上当时在广场上各学校都在负责。我亲身的经历告诉我，实际上这场运动的纠察工作完全靠同学们自觉地维持，否则任何人没有办法。

二十三日决定我是纠察总长之后，下午回来就开始建立总部。晚上开始我到各处去巡查，到堵军车的黄庄、丰台等地方去转，那里已经发生冲突。毛主席像被污的时候我正好不在，重新挂上的时候我在场。当时长安街上一个纠察队员也没有，我当时就急了，当时正好是五点多钟，下班的人一堵就是不得了了。我叫所有的学生紧急拉起封锁线。我因为忙活这些事救了我，因为我从来没上过镜头、报纸。这个时候，一个路过的汽车上有一个香港记者，他看见我在那忙活。后来我在香港再看到他，他就核实了这件事。

和市民的关系。工人自治会改选的时候，韩东方派人来跟我讲，(刘焕文)已经不是常委，他们派了(刘强)跟着我，说是协助工作。

广场改变发生过多次，我每次出外巡查回来都发现广场老有改变，就老要镇压。后来堵军车最外围的人说，“我们实在是太渴了。”让我给他们批钱，我说不行的话，你们就逐渐往回撤，后来说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管广场，再不行就订宣传站。因为宣传站一乱的话，就……我这么多天没有在广场睡过一次觉，除了在联席会上睡，所以联席会的具体讨论我都记得不太清楚。只记得联席会议的十点声明是(甘阳)起草的，举手通过的时候我就举了一下手。

还有最早的军用帐篷是我让小封去接的。

北工自联最早成立的日期，我的印象根本不是五月二十二日，是在戒严之前的五月十八日。我当时亲自让人用长布给他们写的“北京工自联”。

我从广场上撤下来的日期是二十四日晚上，这是我睡得最好的一次觉，是在北京医院，打了一夜点滴，打得胳膊都肿了，我的身体已经基本处于半垮掉的状态。二十九日我去广场开联席会，我的一个同学架着我走。我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总部在什么地方，我只知道纪念碑上面荣玲他们有一个大棚子。我说“我想下去休息一下”，可就是找不着。后来(军涛)就说，“你下去休息。”把我硬送到北京昌平县去休息，这是三十日。

质疑

封从德：你提到五月十七日的“疏导总指挥”。这个总指挥是怎么来的？担任了多长时间？

张伦：有一天多吧，然后开始升格，因为(张新)已经不行了，我就具体地负责起来。当时我跑到广场上高联指挥部要求纠察工作。

封从德：你担任过纠察总长，多长时间？(你后来是辞职子，离开广场什么原因?)

张伦：五月二十四日上午宣誓就职。我当时开始发出第一号令，统一广场的通行证和纠察线，我还写了各校在广场上的位置。

二十九日我去参加会议时已经知道我可能要休息一下。当时跟那几个副总指挥讲过。我晕倒那天晚上，我让一个学生给荣玲送过一个东西。

在，在纪念碑上边二层开的。会中讨论的一些问题，本来是想形成一个东西，但是没有形成。当时说第二天继续开会。为了给历史作证，我说明一点，北知联的几个人象陈学良、王润生、远志明，由于周舵派车去接他们来得晚了，会结束时才到。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所有的人都拉到社科院，在那儿的政治学术所开的会。这个会上关于怎么形成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我并不完全清楚。我第一是疲倦，第二我当时被推荐为纠察总长的时候，就立刻带着工自联和市民敢死队的几个人到另外的一个屋开会，进行纠察工作的部署，这边怎么讨论的我就不清楚。在王军涛的判决书上有一段提到这个问题，说纠察总部张文在逃，“在充任纠察总长之后立刻召集了工人纠察队、市民纠察队、市民敢死队的头目开会，进行分工，编了联络代号，并在北京市地图上标出了戒严部队的所在位置，会后在天安门广场设立了联合纠察总部，配备了对讲机、望远镜，谋划堵截部队的活动。”这里有些人下落不明，我现在不再讲。工自联最早的常委之一刘焕文当时是副纠察总长，现在已经被捕。

5.2 纠察问题

五月十七日广场人数达到一百多万，我在西北角看到很多人被挤倒。我觉得这事非常危险，我就赶到纪念碑上想找人讲一讲。北大的人可能是因为我北大演讲过认识我，就让我上去。上去以后碰到少江，我对他讲，“你要赶快派人把广场上的人群疏散，免得发生危险事件。”少江就说“那你赶快办。”我就变成了疏导总指挥。从那以后就下不来了，就在广场开始负责这些事情。但是我没有完全管这个事情，当时只是看到梁二，王志新、少江太累，我就帮他们处理一些问题。许多人老纪念碑上面跑，他们觉得纪念碑上边肯定有负责的，到处都是“找总部，找总部”，其实我也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十八日下大雨那天少江累得实在不行了，他就说，“实在不行你就来负责一下吧！”我就在广场北面去开辟第二条生命线，派救护车什么的这些事情。下大雨的时候，我带着话筒号称代表总部，沿途慰问在大雨中坚持的学生。

在整个纠察过程当中正式任命的广场上的纠察总长可能只有本人这么一次。实际上纠察这件事情是必不可少，但是效果最差，是最累人，但是最无效的事情。因为人员流动太大。那个张建我不知道他最早什么时候在广场上，但是戒严的那天晚上他肯定是在广场上的。他说他是纠察总长，我还跟同学们说，“既然他是纠察总长，你们就都听他的”。

我觉得实际上当时在广场上各学校都在负责。我亲身的经历告诉我，实际上这场运动的纠察工作完全靠同学们自觉地维持，否则任何人没有办法。

二十三日决定我是纠察总长之后，下午回来就开始建立总部。晚上开始我到各处去巡查，到堵军车的黄庄、丰台等地方去转，那里已经发生冲突。毛主席像被污的时候我正好不在，重新挂上的时候我在场。当时长安街上一个纠察队员也没有，我当时就急了，当时正好是五点多钟，下班的人一堵就是不得了的。我叫所有的学生紧急拉起封锁线。我因为忙活这些事救了我，因为我从来没上过镜头、报纸。这个时候，一个路过的汽车上有一个香港记者，他看见我在那忙活。后来我在香港再看到他，他就核实了这件事。